

国际政界名人译丛

[秘鲁] 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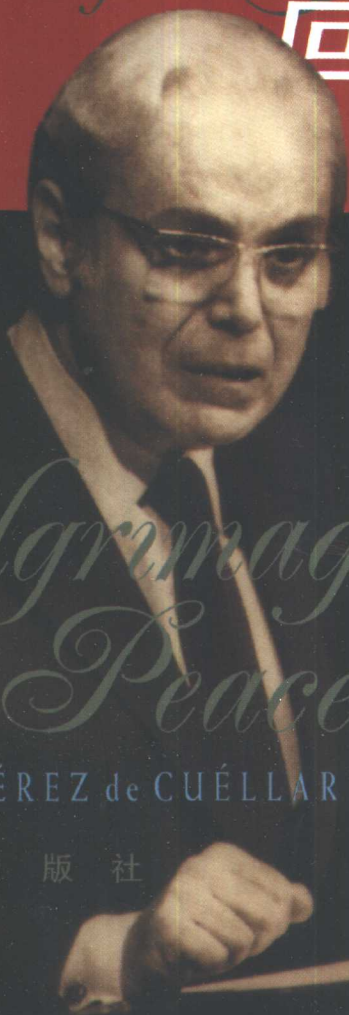
德奎利亚尔 回忆录

王联 等译

*Pilgrimage
for Peace*

HAVER PÉREZ de CUÉLLAR

新华出版社



国际政界名人译丛

德奎利亚尔回忆录

**Pilgrimage for Peace:
A Secretary - General's Memoir**

〔秘鲁〕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 著
王 联 等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奎利亚尔回忆录/ (秘鲁) 德奎利亚尔著; 王联等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10

(国际政界名人译丛)

ISBN 7-5011-5009-5

I. 德… II. ①德…②王… III. 德奎利亚尔-回忆录
IV. K837.7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2348 号

Pilgrimage for Peace: A Secretary - General's Memoir

Copyright © 1997 by 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德奎利亚尔回忆录

[秘鲁] 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 著

王联 等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625 印张 260,000 字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009-5/D·797 定价: 23.00 元

目 录

第一部分 回忆与思考

第一章 萦绕心田的思考	(3)
联合国与经济发展	(4)
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	(7)
冷战余波	(7)
与华盛顿打交道	(9)
停滞的 5 年	(14)
一个新时代	(17)
变化了的世界秩序的挑战	(19)
第二章 从利马走进世界	(21)
初次体验联合国	(24)
通往不定目标的阶段	(25)
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	(29)

第二部分 致力于中东和平

第三章 为黎巴嫩而战斗	(37)
以色列的第二次入侵	(40)

南部的問題	(49)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在停火中的作用	(51)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撤退	(56)
战斗继续着	(59)
在黎巴嫩南部的冲突	(61)
重新开始的內战	(64)
內战的结束	(66)
第四章 决定性的巴勒斯坦问题	(70)
保卫巴勒斯坦	(79)
海湾战争的干扰	(86)
第五章 人质	(91)
亚历克·科利特：一个联合国人质	(91)
威廉·R·希金斯中校：一个为联合国服务的美国人 ...	(95)
在黎巴嫩的其他人质	(97)
海湾战争的影响	(101)
与恐怖分子的接触	(103)
与拉夫桑贾尼总统的讨论	(116)
人质释放进程的继续	(118)
以色列人依然下落不明	(123)
谁之罪？	(125)
妇女受害者	(127)
第六章 没有尽头的两伊战争	(129)
陷入僵局的地面战争	(135)
建立谈判的基础	(137)
谈判的基础	(138)
排除万难，建立信任	(141)
航运战	(142)
同欧罗夫·帕尔梅的夏季会晤	(144)

新的缓和努力	(145)
战争的加剧	(151)
转变之风	(153)
合作中的五大国	(160)
持续的海上战争	(162)
通过第 598 号决议	(164)
执行中的问题	(166)
谈判开始	(169)
停火协议露出曙光	(174)
和平终于来临	(177)
最后的直接谈判	(182)
海湾战争的介入	(185)
附件 (安理会第 598 号决议)	(188)
第七章 海湾战争	(191)
伊朗的行动与安理会的反应	(192)
对伊拉克强制措施的实施	(203)
寻求和平解决的最后努力	(209)
会见两位总统: 布什和萨达姆·侯赛因	(210)
战争的后果	(231)
紧急关注: 人道主义援助	(233)
保护库尔德人	(236)
联合国的接管	(239)
什叶派	(241)

第三部分 为世界和平而奔走

第八章 纳米比亚: 终获独立	(247)
秘书长的卷入	(249)

美国的调停	(253)
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会谈	(255)
回顾	(256)
冷战的缓和影响到南非	(258)
与南非敲定部署 UNTAG 的最后细节	(259)
安理会锱铢必计	(260)
可执行协议的签署	(261)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渗透	(264)
终获独立	(272)
德克勒克与曼德拉	(273)
第九章 中美洲：通向和平的道路	(277)
孔塔多拉集团外交斡旋的开始	(278)
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介入	(280)
阿里亚斯和平计划	(284)
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议	(285)
危地马拉的和平	(287)
海地：多次行动的悲剧	(291)
实现民主的新机会	(293)
第十章 柬埔寨：一个民族的再生	(296)
越南立场的界定	(298)
美国的要求	(301)
制定联合国的战略	(301)
边境的难民和国内的饥荒	(304)
持续但曲折的进程	(306)
巴黎和平进程的开始	(310)
5 个常任理事国的介入	(312)
5 个常任理事国采取行动	(314)
北方的支流	(317)

和平解决的框架文件	(318)
任命秘书长特使	(319)
达成协议	(320)
被强制遣返的难民	(323)
签署和平协定	(324)
附录 (秘书长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谈话要点)	(326)
第十一章 南斯拉夫：欧洲的悲剧	(328)
对塞拉斯·万斯的任命	(330)
万斯的第一次使命	(333)
联合国不断增长的作用	(336)
通向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338)
联合国承担起行动角色	(340)
承认新的共和国	(345)
通向波斯尼亚的灾难	(348)

第四部分 尾声

第十二章 展望未来	(353)
译后记	(358)

第一部分 回忆与思考

我担任了 10 年的联合国秘书长，在此期间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出于撰写回忆录的需要，我不可避免地要思考这一我服务过的组织的性质和取得的成绩，以及那些在今天看来还为我增光添彩的经历。在第一部分的这两章中，我记下了这些杂乱的回忆与思考，以及一些我早先的生活阅历，以便引导出后面更严格而有条理的对冲突与危机的记述。由于有此背景，读者们可以更好地判断，在值得纪念的 80 年代的 10 年（或者更早时期）中，联合国及其成员以及秘书长在世界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一章 萦绕心田的思考

联合国成立以来的岁月，一直是人类的期望值不断扩大的岁月，也是在联合国宪章所阐述的原则和意志的鼓励下不断取得发展的岁月，自觉满足了成千上万的人民要求独立与自由的愿望。在解决经济、社会和人类问题方面进行的合作，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足够的粮食供应以养活这个世界的居民；在医学的进步适应了更高的出生率和更长寿命的希望的同时，社会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医生们集中创造出某种手段，以便稳定出于分享这个世界的慷慨而快速增长的世界人口。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挫折，但联合国宪章所允诺的妇女要求平等的社会地位的希望，也正缓慢地得到实现。

如此这般的发展，如果从联合国已存在半个世纪的观点来看，或者仅仅从我担任秘书长的10年来看，都清楚地显示了这是一个人类独一无二的进步的年代，尽管有时会被那些相伴而生的险情所遮盖。然而，人类的期望超过了所取得的成就，这是可理解的。人类大部分还生活在贫穷的状态中，数以百万的人民被他们所难以控制的力量而赶出家园，破坏性极大的疾病依然未能征服，过多的人口威胁着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在一个能够迅速沟通和全球透明的时代，即使那些生活在边远地区的人民也知道，这种状况可以得到改进。在更全面的范围内满足人类的欲望——那些被不断得到改进的可论证的技术潜力所激起的欲望——

之际，世界将会一直存在冲突。考虑到联合国在未来的岁月中所面临的任务，这一现实必须得到正视。

尽管有时呈现出一种步履维艰的形象，但联合国仍然在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控制、环境保护、人口计划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运动中，充当了奠基者和开拓者的角色。联合国所界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使人们更接近对一个公正和平等的世界的理解。虽然对这种理解的程度还很难测量，但是，我敢确定它们已经取得了建设性的成果。谁能否认，被联合国确立并推广的关于人权的标准，促进了更广范围的对人权的尊重与理解？尽管对联合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存在很多争论，但联合国各功能机构提供的发展援助为人类安康所带来的进步，确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援助、健康状况的改进、对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的支援，都是联合国所取得的成就的例证，它们已经对成千上万人民的生活（以及预期寿命）产生了影响。正像我在位的那些年所认识到的那样（而现在不再为日复一日的危机所带来的错误的影响所左右时更是如此），上述事实都是联合国对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一点对我来说，已经是变得很清楚的事实了。

联合国与经济发展

由于我来自于第三世界，我特别感到不愉快的是，在我的10年秘书长任期中，在共同达成的目标框架内，联合国未能成为一个更有效地致力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工作系统。我很失望，联合国未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带来更具建设性的对话。这首先是由于北方和南方在如何采取最有效的手段争取发展上持有抵触的观点。在不能确定对资源利用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抵制任何要求资源的大规模转移的处理方式，发展中国

家则试图通过宏伟的计划，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增长步伐来寻求进步。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提出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我真的很赞同这一计划所提出的目标，它在本质上是要提高多边援助的级别以及给予第三世界国家对这一援助的更多的控制。但是，我认为这一计划是不现实的，而且过于野心勃勃。富国显然不愿意接受如此广泛、看上去漫无限制的概念。然而，对这一宏伟计划的无休止的争论，带来的唯一后果是北南双方持续增长的不信任。

多年来，有人批评说，在联合国处理经济问题时，由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处来领导是不适当的。我不反对这一点。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前任们，都不是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而且，对秘书处而言，对政治和行政事务的处理总是第一位的。因此，秘书长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他的高级经济顾问们来处理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很少有例外，他们没有公认的理性权力来在联合国系统内或联合国成员国中行使领导权。

在联合国系统中，还存在着经济领域内的结构上的弱点。在它的各个专门机构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着雄厚的财力来促进全球发展。他们像一个独立的机构在运转，开发和实施了许多有效的项目。然而，在我的任职期间，这些项目并没有在与联合国系统的其它部门或者与秘书长相协调的共同战略行动中被系统阐述。甚至就某个特定国家而言，当这些金融机构与联合国其它部门都有着改进现状和未来前途的相同目标的时候，他们也是在矛盾中开展工作的。

经社理事会从来就没有制定全球经济与社会政策的权力与能力，也没有像在宪章中所预示的那样，协调联合国专门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众多针对经社理事会的改革建议都毫无结果。在1987年我提交给联大的年度报告中，我建议经社理事会应该改造成一个部长级的机构以作为提高它的效率的一种手段。这一建议最终被部分地实现了。经社理事会决

定留出一个高级别的“部门”以致力于作为年会一部分的某一特殊主题。结果并没有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我终于得出结论认为，经社理事会是如此地令人联想到失败，以致它危及了争取更高效率的任何可能性。最佳的进程将重新开始于一个新组织，这个组织的宗旨更集中而且权力更强大。

我发现包括了联合国系统内所有专门机构和功能部门的首脑在内的协调委员会（ACC），作为整个系统范围内的各种项目和计划的协调机构，尽管它试图部分地迎合这种需要，但它所发挥的协调作用并不比教科文组织更令人满意。虽然秘书长担任这一机构的主席，但各专门机构并不服从他的领导。他们一点也不依赖于秘书长，不仅因为他们的选拔（或解职）与秘书长无关，而且这些组织的预算也不关秘书长的事。我个人有个习惯，每次开会时总是先谈一谈对国际形势的一般看法，希望以此引导大家——对联合国系统内的各个不同部门如何共同工作以缓解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展开自由讨论。但这样的讨论很少出现。我常常遭遇恭敬的沉默。只有当涉及诸如工资级别、各专门机构的不同退休条件等纯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时，这种讨论才变得活跃起来。当初筹划建立联合国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最先建议这个组织的首脑应该叫作“仲裁者”。我常常并且仍然感觉到这将会是一个好的革新。如果秘书长能行使仲裁者的权力的话，那么，当他面对联合国系统内的各个专门机构的头头脑脑们时将处于一个更强有力的位置，从而更好地起到协调作用。

必须强调的是，虽然这类问题比我所反复遇到的政治危机似乎更让我感到受挫，但它并不能阻止联合国为人类安康所作出的令人瞩目的贡献。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成就是在一个政治形势紧张、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的时代取得的。在我任期的大多数时间里，这些成就还是在成员国对发展的途径以及对人权的阐释有着根本分歧的情况下取得的。

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

这些年在非洲和其它地区发生的经济与社会危机的经历，使我对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在政府及政府间的援助实施之前，非政府组织总是参与提供了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诸如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以及挽救儿童联盟等组织，通常对当地局势有着良好的认知，而且具有令人羡慕的灵活运作能力和乐于奉献的工作班子，他们完全有能力来处理国际事务。

这些非政府组织必须看作是联合国的合作伙伴。我于1983年在秘书处建立了一个部门间的委员会以保持与非政府组织的密切联系，而且下令我的大门始终向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敞开。我经常与大赦国际的秘书长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主席会面。每次到国外旅行之前，大赦国际总是信任地向我简要通报关于人权方面遭到侵害的案例，这样我可以有效地予以干预。我按惯例要在旅行时随身带上这些案例的一览表。我将在完全私下的场合与有关国家的首脑交谈，而且要求他尽可能地纠正这些滥用权力的行为。我经常发现，当我和一位总统走向官方场合时，或是在正式晚宴进行的过程中，这样做都是可能的。不过，我希望不要坏了主人的胃口。尽管我没有做过统计，但我估计90%的案例获得了值得称道的结果。我称之为我的“谨慎外交”。它虽然很细微但却是很明显地表明，通过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的紧密合作，可以给全世界的人民逐渐带来福利。

冷战余波

冷战——特别是它投入巨大的、非生产性的资源用于武器制

造——放慢了二次大战后人类历史进程的巨大变革，但它却不能阻止这些变革的发生。然而，它的确导致了政治关系的僵化。当我在1982年担任秘书长这一职务时，安理会已经僵持了很久。我的前任和我带头试图解决这些冲突，因为存在另一类的真空。在很少的几起美苏不是主角的事件中，比如福克兰群岛危机中，我能够而且也做到了独自来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法。即使美苏是主角，比如在阿富汗，我也能够独立于安理会——苏联在那里的否决冻结了任何行动——而推动导致苏联撤军的协议的达成。尽管撤军基本上还是依赖于美苏之间的协定来进行的，而且只是发生在冷战趋于缓和之际。

冷战的流毒也扩散到了秘书处。某些有影响的美国国会成员，经常受到新保守主义的传统基金会的授意，以为联合国总部主要是作为克格勃的前哨基地而工作的。在国会的坚持下，美国政府为那些来自苏联集团国家的秘书处工作人员设置了严格的旅行限制。为此，我不得不与美国政府展开了严肃的争论，因为这一行动违反了联合国与美国政府签订的《联合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会所的协定》。^①然而，我不能说服美国政府撤销这些限制。

必须附带补充的是，苏联给美国的一些行动提供了不适当的催化剂。很显然，苏联在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中有人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秘书处的职责中去，而我也没有办法判断他们中间有谁来自克格勃。更为糟糕的是，苏联像当时其他的共产党国家（波兰除外）一样，要求它在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他们都临时雇佣于莫斯科——上交相当数目的美元收入给苏联政府，这就给了华盛顿的下列断言以相当大的可靠性，即美国的纳税人是在为苏联间谍支付薪水。只要冷战继续下去，苏联在秘书处的工作人员，

① 1947年6月26日订于成功湖，同年11月21日生效。——译者注。

无论他们是否是克格勃，他们首先忠于的都是莫斯科而不是联合国。他们所得到的任何信息都被要求报告给苏联代表团。因此，我办公室里的苏联雇员都被排除在敏感职务之外，这对他们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挫折。

与华盛顿打交道

不管用什么标准衡量，美国都是联合国最重要的成员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个组织的生命力取决于美国的领导和支持。因此，在我任期的最初年月里，美国政府以及一部分美国媒体对联合国的挑剔态度，极为令人不安。在1982年1月，仅仅在我担任秘书长后的几个星期，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强调了以下四点：

- 联合国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机构；
- 联合国一点也不是它的美国创建者所希望的那样的机构；
- 联合国没有以代表机构通常所采取的方式来反映或集中体现这个世界；
- 对美国以及其它忠实于民族独立、自决与民主的国家来说，最大的问题是，联合国能否被建设成为一个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工具，从而有助于消除而不是扩大分歧。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接着消极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她说，联合国系统“酿成了两极分化”。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的这类声明还有很多，罗纳德·里根政府时期，对确定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是有影响的。这种态度找到了一种对联合国不信任的意识形态的表述方式，认为联合国是这样一个组织，在那里民主面对的是共产主义和其它独裁政权所组成的大多数。

按照这一观点，联合国所拥有的权力越大，这些不民主的势